



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2012年8月出版的《泛市场化批判》一书,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学者们认为该书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构建理论框架,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本身需要,而成为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历史过程这样一个全新理论观点。作者在对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全面回顾总结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升华,提出这场改革是一个没有稳定参照系的经济变革,是在缺乏成熟的或权威性理论指导下的改革这样一个全新理论观点。作者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深刻质疑泛市场化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提出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改革与发展绝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化的理论观点。此外,作者在对中国当代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以“软实力”为核心加速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以及国家经营与经营国家的理论概念。有鉴于此,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日对该书作者田广博士(以下简称“田”)进行了专访。

■ 本报记者 周新军

记:您的《泛市场化批判》一书的基本观点 and 中心思想是什么?

田:本书最基本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不得不勇敢地承认,这场改革是一个没有稳定参照系的经济变革,是在缺乏成熟的或权威性理论指导下的改革。虽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了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但主观设想与实际情况总是有差别的,因此,在实际进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失误,必须加以修正。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对国际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增加,而提高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机会成本。本书实际上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进行总结和反思。

在书中我们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视野看,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上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本身需要,而成为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历史过程。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我们预计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目前美国经济总量的二倍,占世界经济总额份额的百分比将由目前的9%增加到24%。

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拥有了更多的发展实力和展示空间。但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没有缺陷的,也并非没有产生负面的影响,其中最大的一个缺陷或者失误,就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泛市场化的现象。这种现象给我们国家带来许多发展中的困惑,其中最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格局。在书中我们对曾经比较流行的泛市场化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反思,提出了纠正泛市场化思想谬误及其给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带来的危害的具体建议。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加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思,特别是国家经营与经营国家的理论概念,供决策参考。

记:在当前我国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形势下,您提出对泛市场化现象进行批判有什么现实意义?

田: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一样,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有历史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只要认真地分析,就会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冲破了万般阻力向前进的。我们深入探讨分析并质疑曾广为流传的泛市场化思想思潮及其负面影响,提出了纠正泛市场化理论的提倡者看来,只有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按照市场规则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理论观点以经济科学的方式,泛滥于中国大陆,似乎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只有市场化一条道路可走。在此种思潮的误导下,一些本来不应该市场化的部门与行业,也被市场化了。一些人错误地认为通过泛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可以使得中国达到一个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格局,这就从根本上歪曲和异化了邓小平总设计师所指定的中国改革的真正目标和方向。

毫无疑问,泛市场化的谬误影响,导致了一些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行为,这种不顾一切的市场化类型的激进改革,常常适得其反。俄罗斯曾经引进实施的“休克疗法”改革,就是极端的泛市场化行为,是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其结局之糟,全世界公认。其实,泛市场化思潮的根源主要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因此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泛市场化思潮否定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歪曲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从而否定了人类发展是一个由多种文明组合而成的社会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竞争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不能超过一定限度的,过之而会不及,欲速则不达。

当前,大众对泛市场化经济思潮导致的种种消极现象的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强烈不满。同时,学界人士也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做出了不同层面的解读,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面对现实中的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继续深刻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为这样做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了前些年来泛市场化思潮的谬误所在。有鉴于泛市场化的危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郑重地提出了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科学整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所提出的,党的第十八大报告勾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多次指出,当前在我国必须坚持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的准则,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田:我非常赞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思想。他最近不断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我们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社会公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引入了大量的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理论,这些经济理论一方面有其独到的普遍性和全球性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也的确有明显的倾向性。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先进理念,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工业化国家发展得很快,但市场经济理论还不至于穷尽人类所有的经济思想理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市场经济的观念和由此而引申出来的政策,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为某些利益集团或者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国际市场中是为工业化强国获得超额利润服务的。

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传统为参照,我们认为在反思经

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对以下几点加以说明。其一,单纯以GDP为指标衡量社会的发展程度,以人均GDP来考核人民的生活水平,脱离了中国人多资源相对少的国情,脱离了自古以来形成的量入而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惯,鼓励所谓的超前消费、信贷消费等,而结果却不能达到策划者的设定目标。其二,过度强调经济效益而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公平,由此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后果,导致大众求富的夙愿不能得到满足,逐渐累积起了在不同程度上的不满。其三,虽然正确的认定物质文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不断强调精神文明的作用,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致使一些年轻人轻视自己民族流传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丢失了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动权,结果是部分人由此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总之,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当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准则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本身需要继续充实,同时也有个实际上的理论演变过程。因此,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困难,从理论上升华是必须的。在激烈的国际综合实力的竞争中,我们没有逃避的余地,惟有将国家建设搞得更好,强盛富裕,才能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宏伟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相一致,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记:您刚才提出泛市场化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的现实格局,不过有一种理论观点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先变大,经历一个最大值以后,再逐渐变小,其政策效应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经济发展贫富差距会自动缩小,您对这个理论观点有什么高见?

田:这个理论观点实际上来自库兹涅茨(Kuznets)的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理论模型。其实这个理论模型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而已,源自1954年库兹涅茨在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就职演说。在其就职演说中库兹涅茨宣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增长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期,然后在增长的后阶段会逐渐缩小。实际上在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理论模型之后,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其理论假说进行了严肃科学的质疑,比如罗宾逊(S.Robinson)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曾发表一篇著名论文指出:一个仅含有极少数假设条件且非常简单的模型,宣称倒U现象是一条经济法则,是不够严谨也是不负责任的理论假说。经济学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理论阐述不断涌现,但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我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两位学者朱明熙和代灵敏,选取了13个发达国家,6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通过对这些国家近100年最高收入比重所占份额变动情况的分析,从长时间序列数据的角度验证“倒U曲线”是否存在。他们的研究表明,从一百年来来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史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随市场经济和经济的展,贫富差距自动缩小的趋势,因此库兹涅茨的收入和财富的倒U曲线根本就不存在。

同时,朱明熙和代灵敏的研究发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到70年代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出现缩小,并非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调节的结果。而国家之所以要调节,恰恰是经济、社会矛盾严重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对于我国正在日益扩大并为国人所诟病的贫富差距,试图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来调节缩小,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要想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干预作用。这一点已经为国内外的实践,尤其是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无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充分说明。这也解释了我们在《泛市场化批判》一书中,为什么提倡要实施国家经营与经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张。

记:请问您对未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发展有什么看法?

田:正如前面所说过的那样,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拥有了更多的发展实力和展示空间。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也愈加激烈,中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处理好复杂多变的事物,改革行为自身要不断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要创新出更高且更加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指导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八大所制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路线,明确地告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既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和功能。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前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途径加以调整。国家需要不断发展,生活还要继续,生命也要延续。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福祉,也要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精髓所在,即为人民服务。这是唯物主义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位置,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方向,两者的相互促进,才能达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除了对于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应该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措施是否存在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正确,要真正地摆事实讲道理。这样严肃认真的做法,可以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家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中国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实践、摸索、总结出一些原则,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今,人们已经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既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又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和功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自然,这些有特色的鲜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有很多不完善的方面,还需要更为谨慎地再斟酌,增添或删减。特别是观察问题的目光不能单纯地局限于狭隘的经济领域,要站在建立人类社会最先进社会制度的立场上,为国内各族人民谋求更多的福祉。为此,就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机械地引用仅从理论或技术角度讲没有纰漏的一些市场经济理论,那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忽略了“国情不同”这个关键性要素,将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搁置于一个不存在的沙滩之上。

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推进创新型国家的系统理论,要抓住经济建设

外眼看中国



中国欲让国企更像民企

乍一看,中国经济改革议程中最显著的缺失,是如何削弱国企的影响力。

不少自由派人士曾希望改革决议能减少国企的重要性,但与之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然将国企摆在了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上。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称:“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不过,这一表述可能有些误导。对各个行业的国企来说,中国打算推行的改革将削弱它们享有的特权,实质上是一次重大(尽管是间接的)挑战。中国政府并不想消灭国企。相反,“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驻上海策略师崔伟(David Cui)表示:“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那将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产生巨大影响。”

从面临激烈揽储竞争的银行,到因蒙受亏损而不得不变卖资产的工业企业,中国国企受市场因素影响的程度,已远远超过十年前。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世纪90年代激进的企业改革。那场改革是由时任总理朱镕基发起的。成千上万的破产国企被关闭,5000万工人下岗。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零星出现的工人抗议活动中感受到那场改革引发的震荡。

如今,中国国企已成长为与朱镕基时代相去甚远的“怪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国企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一个衡量企业效益的指标——为10.9%,大大高出1996年的2.2%。然而,国有工业集团

这个中心不动摇。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应当夯实经济基础,突出高技术手段支持下的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强敌在外,国家不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法实现。要以调整国家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为依据,以营造最充分的就业环境为方向,以实现全民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为阶段性目标,如此,人民才能生活富裕幸福,国家才能强大兴盛。在对既往的经济建设和途径加以调整。国家需要不断发展,生活还要继续,生命也要延续。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福祉,也要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精髓所在,即为人民服务。这是唯物主义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位置,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方向,两者的相互促进,才能达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除了对于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应该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措施是否存在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正确,要真正地摆事实讲道理。这样严肃认真的做法,可以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家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形态和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改革所要建立的正确的有效率的体制。因为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历史上,社会主义首次提出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施社会全体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政策,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别于在其之前的资本主义等所有阶级统治形态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是能够极大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制度。“社会主义”四个字是可有可无,“中国特色”四个字也决不能丢。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我们必须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提到反思,就是要敢于超越常规逆向、提出疑问并反向进行思考,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前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螺旋式向上发展的。换言之,人类社会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很可能会经历一种发展了的回归现象,这种回归当然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是富有创造性的将过去的所作所为加以补充提高后,在一个新的起点有继承和发展的前进过程。

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它们的财力逐渐增长,它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中国民企抱怨称,自己很难与国企竞争,无法获得像国企那样的投融资机遇。此外,国企的生产率增长已然停滞,他们的股本回报率现在落后民企竞争对手约10个百分点。

这些问题成为习近平新一轮国企改革出发点。首先,中国政府承诺向更多民营资本开放包括金融和能源在内的受保护行业,这为企业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预计这类开放的程度将不会太大。习近平改革举措中的第二部分至为关键,那就是让现有国企即便不能在最终所有权上接近民企,也要在运营方面向民企看齐。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朱海滨表示,改革“将主要聚焦于提升国企部门的运营效率”。

中国政府将允许国企引入员工持股计划,以此来鼓励经理入把利润当作目标。另外,在董事会中引入更多私人投资者,也会提高更注重业绩的股东所占的比例,从而对国企起到约束作用。而比以上措施更重要的是,是那些将改变国企运营环境的改革措施。让市场更多决定能源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将削弱国企相对民企竞争对手拥有的种种优势。

近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地方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国有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因货币环境趋紧,不得不压缩了原定的债券发行规模。今年工业部门也出现了好几个市场因素影响国企的例子。造船企业中远集团和化工企业云维集团的上市公司在出现巨额亏损后,为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得不宣布变卖资产。(FT中文网)